



新世纪民族音乐创新教育丛书

NEW CENTURY NATIONAL MUSIC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ERIES

包·达尔汗 总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学会杯 获奖文集

AWARD WINNING ESSAYS OF
THE 1ST - 3RD MUSIC SOCIETY FOR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COMPETITIONS

(第1-3届)

◎ 和云峰 包·达尔汗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新世纪民族音乐创新教育丛书

NEW CENTURY NATIONAL MUSIC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ERIES

包·达尔汗 总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学会杯 获奖文集

(第1-3届)

AWARD WINNING ESSAYS OF THE 1ST - 3RD MUSIC SOCIETY
FOR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COMPETITIONS

和云峰 包·达尔汗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会杯”获奖文集(第1—3届)/和云峰,包·达尔汗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660-1453-5

I. ①中… II. ①和… ②包…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音乐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J6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8992 号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会杯”获奖文集(第1—3届)

主 编 和云峰 包·达尔汗

责任编辑 周雅丽

责任校对 胡菁瑶

装帧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41

字 数 75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453-5

定 价 19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包·达尔汗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是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号）启动的重大教育工程。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发挥自身优势，办出专业特色。“十一五”期间在本科院校中择优重点建设2500个“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和500个“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其中，“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建设内容包括了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构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加强新教材建设；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践教学，推进人才培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等。“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旨在通过改革和建设，培养一批经济社会发展的亟需人才，并集成取得的有效经验和实践效果，形成该专业建设内容的相关参考规范，发挥推广和示范作用。

在众多专业的申报竞争中，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最终获得了第二批“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项目资助，这是继2007年“民族音乐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国家级教育教学重点项目之后获得的又一个重要成就。“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学）的获批，再次印证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所具备的办学实力和办学特色，同时肯定了其在我国民族音乐教育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有五十多年的办学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培育民族音乐人才的宝贵经验，向社会特别是向民族地区输送了大批优秀的音乐表演、音乐创作以及音乐理论研究与管理人才，为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社会不断发展，对音乐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培养出更好而且更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音乐人才，是当今音乐教育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是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存在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特征以及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特点，如何培养符合民族地区需求的音乐人才显得尤为重要，亦更为复杂。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独依靠音乐教育，还必须依托多种学科的共同协作。



国内音乐人才的各种培养模式已形成了一定规模，各级音乐类专业院校以及师范类院校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实践，但对于民族音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则一直是学界公认的难点。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依托于中央民族大学丰厚的学术资源，联合相关学科，形成集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表演艺术、民族音乐创作理论及民族音乐教学实践为一体的治学模式，重点探寻民族音乐教育的创新理论，以培养具备较高表演艺术水平和民族教育理论修养的音乐人才，其突出特点在于研究和探索适合于中国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特征的民族音乐教育理论、教育模式，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特别是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特征的音乐人才。

多元的文化必然需要多元的认知，单一的音乐教育理论显然不能解决多样的音乐教育问题。多年来，由于我国音乐教育界对民族地区音乐文化以及音乐教育的关注不足，这方面的了解和认识与现实有一定差距，民族音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恰恰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运用普遍的音乐教育原理去探寻特殊的民族音乐教育实践，不仅对我国民族地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民族地区民族音乐文化的保存、继承和发展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新世纪民族音乐创新教育丛书》是继“民族音乐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建设之后启动的“第二批特色专业建设点”（音乐学）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从国内外民族音乐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中筛选出具有一定创新性、代表性和鲜明民族特色，并适合于21世纪我国民族音乐创新教育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指导的论著、教材和音乐作品，旨在实现民族音乐教学内容与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不断完善。

2011年3月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的历史 回眸与学术评介 (代序)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后文简称“学会”）正式成立于1986年，是中国各民族音乐工作者自愿结成的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非营利性全国一级学术团体。学会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团结、组织、服务中国各民族音乐工作者倾尽心力，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抢救、保护、传承、研究、发掘和开发工作做出了积极努力，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建构做出了特殊贡献。

回眸学会萌芽、建立、壮大的历史，感慨良多；纵观学会成立以来的学术发展和取得的学术建树，令人欣慰。本文即是对学会历届学术年会（后文简称“年会”）的历史回眸与学术评介。

一、学会年会的历史回眸

学会自1986年“第二届学术年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以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举办或联合举办了多场形式各异、主题鲜明的学术会议，对发现和扶持少数民族音乐理论人才等做出了积极努力，为加强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者之间的团结与联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会萌动期

此以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至1984年7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少数民族专题研究”为起讫。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先后从多种角度介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原始资料的搜集、调查、积累、分析和研究亦逐步深入。集中表现在各种学术会议的密集召开以及与此类会议密切相关的学理溯源、价值领域、研究方法等亦层出不穷。



众所周知,由于研究工作的进展与需求,一种相对疏散,但又相对固定的民间学术团体渐次产生(此时期笔者谓其“萌动期”),孕育和催生了当时音乐界的两大学术组织。为此,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期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与研究领域,可以从纵向的“多学科理论及方法介入”和横向的“多视角研究课题选项”两方面加以概括。^①无疑,维系学者、成果的各种年会,成为我们反观此段历史的一面“镜子”。

1. 南京会议(即“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一届年会”)

1980年6月13日至21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聚集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是由高厚永先生倡议、牵头,并由沈洽、赵后起等共同参与,历经一年半筹备后的产物。^②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民族音乐学学术会议”^③。大会首

① 详见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载《黄钟》,2005年第1期,第10页。

② 参见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载《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3期,第14页。

③ 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别具风格的江南丝竹》《气势磅礴的吹打音乐》,湛亚选:《中国民族音乐学导论(以曲艺音乐为例)》,叶栋:《民族创作乐曲的发展(两个三十年)》,夏野:《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方妙英:《论楚宫体系民歌的音乐思想》,安禄兴:《民族音乐的形象思维探索》,铁军:《中西旋律运动的差别》《调式研究和旋律写作》,黄锦培:《民族音乐教学问题的设想》,赵后起:《唐代变文浅论》,茅原:《试谈栋康的音乐思想》,刘兰:《自居易与音乐》《〈非乐〉浅释》,杜亚雄:《阿炳传略》,张振基:《阿炳音乐的艺术特点》,程茹辛:《二泉映月曲调渊源探索》,沈洽:《阿炳事考一二及其他》,曹正:《关于潮乐二四谱和二四谱与工尺谱关系的探讨》,冯亚兰:《陕北民歌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冯明洋:《论广西各民族民歌在音乐风格上的分化融合与并存现象》《论壮欢的音乐文学特色》《论多民族地区民歌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广西民歌体裁述要——广西民间歌曲序》,耿生廉:《浅论民歌中的衬词和衬腔》,杨匡民:《湖北民歌的地方音调探索》《湖北民歌的曲种腔调探索》,简其华、王曾婉:《论新疆伊犁维吾尔族民歌》,袁炳昌:《谈爱尼族民歌得波措》,樊家城:《左权民歌开花调分析》,李新学:《蓬莱套号筒探》,易人:《孟姜女春调的流传及其影响》,卜锡文:《花儿的流传与体系》,张梅:《民族音乐的一束鲜花——广西二声部山歌简介》,刘俊礼、李新学:《胶东渔号子概述》,罗传开:《上海田歌的体裁特点》,刘式昕:《介绍几首侗族多声部民歌》,王凤贤:《论二人转音乐特性》,袁静芳:《鲁西南鼓吹乐初探》,王希彦:《鲁西南鼓吹乐试探》,王震亚:《吴氏〈潇湘〉初析》,周宗汉:《我国少数民族器乐发展问题》,王直:《关于民乐队的建设和编制问题的探讨》,孙从音:《戏曲唱腔与语言的关系》,刘国杰:《论京剧皮黄腔旋律的发展和变化》,连波:《论吟诵性唱腔节奏处理》,郭强:《京剧〈四郎探母〉的音乐分析》,安禄兴:《论戏曲唱腔的“基本调”》,冯光钰:《川剧高腔音乐改革议》,陈维伦:《西洋乐器能不能奏好戏曲音乐》,张淑霞:《吉林汉族民歌调式分析》,阎定文:《祁太秧歌调式初探》,黄凌:《论民族音乐中的调式思维因素》,钟善祥:《对川剧高腔音乐中调性和调式的初步探索》,武俊达:《谈戏曲唱腔的旋律和宫调》,姜元禄:《刘天华二胡曲的旋律特征》,薛金炎:《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曲式》,黄凌:《论民族音调的旋律线》,李民雄:《传统民族乐器的旋律发展手法》《民族打击乐的特征构成和写作手法》,甘涛:《江南丝竹的演奏特点》,高铁军:《陕北音乐分析》,阎定文:《祁太秧歌句式结构初探》,叶栋:《民族器乐曲中的八板体》,陆华柏:《广西壮、瑶、侗、仫佬、毛南族二声部民歌的多声音乐构成初探》,胡登跳:《民族乐队的规范化问题》,易人:《运用江苏民歌进行改编创新的探讨》,徐荣坤:《民歌创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谈民歌的演变创新与几点体会》。转引自佚名:《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第151页。



日，此次会议的发起人高厚永教授便作了题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长篇报告，该报告分为音乐学的历史回顾、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民族音乐学的教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社会处境四个部分。^①

此次学术讨论会“是包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在内的开阔视野、接受西方音乐学理论而深入进行学科学理思考的前奏。……召开的意义在于：它首先宣告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新兴分支学科，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界得以传播和运用；其次，由于这一传播和运用很快即促成‘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两个全国性学术组织诞生，以及由这两个学会发起、主持的音乐学术讨论年会的定期举行”。南京会议以后，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先后开设了民族音乐学概论课程，向学生们介绍民族音乐学这门新兴学科。^②

此次会议，代表们还一致决议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筹建小组”。经过协商，筹建小组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湖北艺术学院、贵州艺术学校九个单位组成，并准备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于1982年在更大范围内召开“第二次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大会商定，中央音乐学院为下次会议的联络点。^③



图1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一届年会与会代表合照（1980年南京）

① 参见杜亚雄：《回忆和思考——纪念南京会议二十周年》，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3期，第15页。

② 参见杜亚雄：《回忆和思考——纪念南京会议二十周年》，载《中国音乐》，2001年第3期，第16页。

③ 参见袁静芳：《记在南京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第64页。



2. 北京会议（即“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届年会”）

1982年8月10—19日，“第二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本次会议是1980年6月“南京会议”的继续。会议有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艺术院校、学术机关和有关部门的近150名专业研究和教学人员参加。与会代表的论文选题除汉族传统音乐外，还涉及满、壮、苗、侗、傣、瑶、彝、高山、裕固、布依、维吾尔、哈萨克、达斡尔等10多个少数民族音乐。



图2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届年会与会代表合照（1982年北京）

“北京会议”是在文化部和中國音乐家协会的支持和领导下，由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和中国音乐学院共同筹办的，本次会议将“学术讨论会”改为“年会”，这意味着两年一度的学术活动被正式固定下来。

3. 贵阳会议（即“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

1984年7月12—20日，“第三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就“民族与民族间音乐关系”“民族与民族间音乐和多学科理论的关系”“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少数民族音乐志撰写”等问题，向年会提交了13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全国30余个少数民族的多种传统音乐。

“贵阳会议”可以说是其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各自独立召开学术年会的起点。由于本届年会聚合的学者众多，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逐渐复杂与深入，经执行组成员的广泛商议，决定从下一届年会起，将分“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两个主题，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举行会议。

4. 其他会议

自1980年“南京会议”至学会成立的4年间，除前述会议外，全国还先后多次召开了内容与形式各异的各级各类学术会议。各种讨论会、交流会，以及个人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也促进、加速了学会的成立。综观此类学术会议，较有代表性的专题研讨会会有以下两个。



（1）广东会议（即“广东音乐专题学术研讨会”）

1981年8月19—27日，由广东省民间音乐研究室牵头，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省首次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会。研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20余篇，内容涉及广东音乐的历史、艺术特点、创作、演奏以及推陈出新等多个方面。会议以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等形式展开。会议期间，还进行了广东音乐新作品试奏和传统曲目演奏。^①

（2）南宁会议（即“全国部分省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

1982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本次会议，壮、侗、苗、瑶、彝、畲、景颇、纳西、布依、仫佬、毛南、僮僮等民族的民间歌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音乐理论工作者一道，通过观摩、研讨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切磋，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客观地看，上述学术会议的召开，与同时期中国音乐家协会所举办的两次“中国音乐史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南京的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②这些会议的召开，为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交流与年会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萌动”作用。

（二）年会成型期

以1984年7月在贵州贵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学术年会”至2016年在福建霞浦召开的“第十五届学术年会”为起止，以历届年会召开时间为序简要分述。

第一届年会（1984年7月12—20日），即“第三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后追记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传统音乐专题——后追记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一届学术年会”）分别在贵阳、沈阳两个片区召开。

贵阳片区的与会者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他们中有蒙古、藏、回、满、汉、苗、白、壮、侗、彝、达斡尔、朝鲜、布依、锡伯等民族近200人。大会共提交、宣讲论文130余篇，主要议题涉及“民族与民族间音乐关系和多学科理论探讨音乐发展规律”“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少数民族音乐志撰写”等研究。

^① 参见冯光钰：《广东召开“广东音乐专题学术讨论会”》，载《人民音乐》，1982年第2期，第55页。

^② 参见苗晶：《民族音乐理论工作的可喜进展——福建、广东、山东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述评》，载《人民音乐》，1982年第3期，第38页。



图3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后追记为“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1984年贵阳）

沈阳片区则于1984年8月5日—13日召开，该次会议以民族音乐形态学为中心议题。与会者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5个单位从事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的80位研究者参加，共宣讲、提交论文70余篇。



图4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后追记为“第一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1984年沈阳）

第二届年会（1986年7月24日—8月6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此次会议有来自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1个民族代表共计70余人，提交论文60篇，其内容涉及我



国24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

大会期间，通过了学会领导机构和组织名单，并且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考察期间，举行了第一次理事扩大会。与此同时，此次年会也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笔者谓其“齐齐哈尔共识”）：争取出版年会论文集；建立学术资料室；聘请或吸收舞蹈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者参加学会，以便深化研究工作，加强学科间的联系；积极配合音乐教学工作，为中小学提供一套我国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的录音材料；建立会员学术档案和学会学术档案；重视基层会员的发展工作；等等。

第三届年会（1988年11月26日—12月2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

会议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与未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志的体例和撰写方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学会于1991年将本届年会43篇论文，按“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未来”“少数民族音乐志的编写体例和方法”“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少数民族乐器和器乐研究”“其他研究”划分为五部分，由云南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

第四届学术年会（1990年8月18日—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和伊克昭盟巡回举办。

会议就“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内蒙古各民族音乐专题研究”“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学会于1993年将本届年会论文汇编，按“少数民族音乐总体性研究”“少数民族音乐乐曲、种类及形态结构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溯源及风俗音乐研究”等排序结集出版。

第五届年会（1993年8月11日—15日）在辽宁省抚顺市召开。

此次会议上，宣读了扎木苏的《蒙古族音乐史》，杨民康的《布朗族音乐史》，吴荣发的《苗族音乐史》，范西姆、赵毅的《壮族音乐史》，石光伟、刘桂腾的《满族音乐史》以及朝鲜、鄂伦春、土家等九个民族音乐史的相关论文提纲，会后部分论文结集出版。^①

第六届年会（1995年8月20日—26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

该届年会由学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国家民委文宣司、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文联、广西文化厅、广西教委、广西民委联合主办，由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文联承办。会议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壮、侗、苗、土家、哈尼、白、藏、回、土、锡伯、蒙古、满、达斡尔、朝鲜、汉15个民族代表，以

^① 欣立：《中国第五届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在抚顺召开》，载《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第103页。



及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学者，共87人参加。

第七届年会（1997年8月15日—20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

学会与贵州音协于1999年将本届年会论文94篇（其中含29篇提要），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为题，按“少数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少数民族民歌研究”“少数民族民俗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创作与技法研究”“其他”划分为六部分，由贵州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

第八届年会（2000年8月10日—2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合办）召开。

大陆及台湾地区共1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年会，并向会议提交了相关学术论文101篇。这些论文选题广泛、视野开阔，总体上被评价为“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学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此次年会，共有98位学者在分组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同时进行了学术研讨，会议气氛热烈，代表们发言踊跃，畅所欲言，见仁见智。

第九届年会（2002年10月3日—6日）在贵州省黎平县召开。

该届年会是由广西艺术学院、贵州省音乐家协会、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政府与学会联合主办，黎平县人民政府与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联合承办的。会议收到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属音乐院校和韩国代表的论文共计50余篇，提要近30篇，与会代表100余人。广西艺术学院、贵州音乐家协会与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还分别向大会提交了《侗族大歌研究专题文集》（含论文13篇）、《侗族大歌研究在贵州》（含论文19篇）两本文集。会议结合大会发言、论文宣读、主题宣讲、自主辩论、民俗音乐实地考察等议程，就“少数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新探索”“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侗族大歌与壮侗族群音乐专题研究”三大专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与争鸣。与此同时，大会还就侗族大歌拟申报“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需做的准备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会后，此次会议论文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结集出版。

第十届年会（2005年7月17日—20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100人，列席34人。共提交学术论文102篇。会议期间，大会还组织全体代表参加、观看了聂耳文化广场剪彩仪式，瞻仰了聂耳故居，观摩了“聂耳故乡全国歌手唱云南”、“生态玉溪礼赞”（群众花灯歌舞晚会）、“聂耳民族乐团与竹乐团”三场音乐、戏剧演出；并前往新平县漠沙镇和江川县抚仙湖，实地考察了花腰傣与彝族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俗风情；参观了玉溪红塔企业文化和江川县青铜器博物馆。这些活动使代表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①

^① 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聂耳音乐学术研讨会纪要》，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38页。



第十一届年会（2008年11月2日—6日）在北京西山召开。

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弘扬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传统，交流近年来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面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少数民族音乐创新教育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该届年会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福建、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位专家、学者，就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探讨。

第十二届年会（2010年12月3日—7日）在广西南宁市召开。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中国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百色市人民政府和平果县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研讨会”得以顺利召开，并圆满落幕。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人员，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新疆、陕西、甘肃、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香港等23个省（省、市、自治区、特区），包括汉、壮、蒙古、藏、维吾尔、回、苗、瑶、畲、土家、布依、侗、毛南、傣、白、景颇、纳西、羌、满19个民族的学者、专家和青年学子共244人。研讨会上，共宣读论文154篇，内容涉及鄂伦春、达斡尔、赫哲、蒙古、维吾尔、回、撒拉、藏、壮、布依、侗、毛南、京、傣、瑶、苗、德昂、景颇、京、阿昌、普米、土家、土、高山24个民族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音乐教育与传承、保护。^①

第十三届年会（2012年7月17日—26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

此次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和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会议期间，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安排全体参会学者为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周吉先生的铜像揭幕，体现了对前辈学者的缅怀与敬意，同时组织单位也呈现了两场精彩的演出。与会学者在享受新疆丰富音乐文化盛宴之余，深深感受到组织单位的辛勤付出与良苦用心。三天会议行程结束后，组织单位为与会者安排了五天的“环东天山传统音乐文化考察”活动。该届年会参会者来自新疆、西藏、云南、湖南、江苏、广西、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以及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近110人，会议

^① 转引杨秀昭：《蓬勃的学术氛围与成熟的研究理念——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研讨会的学术总结发言》，载《中国音乐》，2011年第2期，第195页。



共收到论文 80 余篇。^①

第十四届年会（2014 年 7 月 15 日—21 日）在贵州贵阳市召开。

本届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贵州省文化厅、贵州师范学院主办，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贵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贵州省文化馆共同承办。参会者分别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内蒙古、新疆、北京、台湾等地区及美国，共计 180 人，收到学术论文 131 篇，有 91 人发言。^②

第十五届年会（2016 年 11 月 3 日—7 日）在福建霞浦市召开。

该届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期间，在主办方安排下，还对福安市溪塔村畲族原生态歌场以及霞浦县半月里畲村展示的闽东各地畲族传统“歌言”、巫道法舞和群众自发性歌会进行了集体实地调查。^③

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学术评介

学会自成立以来，独立召开年会十三届，出版年会学术文集 7 部；联合召开年会两届，出版了以学会主导或牵头的学术著作 8 部；宣读论文 1310 多篇。学会为中国音乐学历史与内涵的建构，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调查、分析、研究、运用等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就基本确立。笔者赞同伍国栋《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一文之观点：“衡量一项科学领域得以创建的标准，一是要看它是否已具备比较规范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个基础也可以说是它必备的学术理念或学术背景；二是要看它的研究领域是否体现出应有的独立学科特色；三是要看它是否已完成一批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科研成果；四是要看它是否已凝聚一批专门从事此项科研工作的研究人员。”也就是说，上述学科理念与背景的形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实地调查资料、实地调查方法和学术理念初期积累等方面，做好前期准备和铺垫的判断”^④。

① 转引李建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载《人民音乐》，2012 年第 11 期，第 56 页。

② 转引欧阳平方：《总结经验 理论反思 规划展望——“纪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四届年会”述要》，载《人民音乐》，2014 年第 12 期，第 48 页。

③ 转引李建军：《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综述》，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49 页。

④ 转引伍国栋：《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载《中国音乐学》，2004 年第 3 期，第 13 页。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会的成立，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此时期，相关的研究内容、学术领域、价值理念、研究手法等，均可从历届年会的大会议题和所提交的论文中得到明证。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起步较晚、研究力量分散，国家没有对此制订相对全面的研究规划和布局，因此截至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第一，大民族研究者多，小民族研究者少。第二，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第三，介绍性文章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少。第四，民歌乐器研究文章多，曲艺戏曲研究文章少。第五，对传统音乐研究较多，对音乐现状研究较少”^①。现将历届年会分大会议题、学术评介、学术关照来进行扼要评介：

第一届年会（第一次贵阳会议）

大会议题——民族音乐形态学研究。学术评介——“贵阳会议”是中国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音乐专题学术研讨会，因而此次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之相对应的“沈阳会议”则围绕民族音乐的节奏、旋律、音阶、调式、乐律以及曲体结构，民歌的风格、色彩和“色彩区”划分，对民族音乐学的概念、范畴、对象、任务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后，会议还就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学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②学术关照——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任务、目的以及研究的方法、内容等方面。关照点亦涉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与社会、语言以及美学观念、音乐型态分类、音律等多方面。^③

^① 转引袁炳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93页。

^② 参见梵明：《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分片在贵阳、沈阳召开》，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第80页。

^③ 其中，杜亚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杨士清：《达斡尔族源于黑龙江流域四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民间歌曲的比较分析》，伍国栋：《从侗寨鼓楼坐唱管窥侗族大歌的历史渊源》，赵润波：《满族民间音乐调查报告》，东丹甘：《关于芦笙》，吕光辉：《彝族的古代“曲各”形成的探索》，黄镇方：《云南民族民间传统歌舞音乐的原始风貌》，蒋小风：《第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分音在少数民族音乐中的应用——少数民族音乐中的半音体系和微分音体系》，卜锡文：《河湟花儿纵论》，雪康·达吉：《论西藏堆协、朗玛音乐的历史来源》，陈自明：《外国民族音乐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范西姆：《广西花山古崖乐舞考》，崔顺德：《中世纪以来我国朝鲜族音乐的发展》，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形成与发展管见》，杨秀昭：《广西少数民族音乐的中立音与中立调》，玉赛因·克里木：《关于维吾尔族音乐史之我见》，曹汝群：《傣剧音乐的历史、发展及其现状》等论文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进行探讨。参见梵明：《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分片在贵阳、沈阳召开》，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第80页。



第二届年会（齐齐哈尔会议）

大会议题——亚洲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音乐的专题研究；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生活与教育状况的调查以及继承、发展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建议。学术评介——此次会议是学会历史上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并产生了学会首届领导集体；^①达成“齐齐哈尔共识”；开创了学会集体采风的先例。与第一届年会相比，本届年会论文的研究题材与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更加深入。这些论文中，既有宏观全面的探讨，又有微观细致且较为深入的研究。令人可喜的是，有的论文还突破了以往单一、封闭的研究局限，把民族音乐研究与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结合起来，并且运用多层次、多侧面的方法，使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深入发掘、收集和整理少数民族音乐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②学术关照——亚洲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生活与音乐教育现状；第一次组织代表进行实地调查、采风。^③

第三届年会（第一次玉溪会议）

大会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状与未来；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志的撰写提纲。学术评介——此次会议，代表们共提交论文71篇，内容涉及37个民族音乐领域的多个方面。有的侧重于理论探索，有的侧重于实际分析，思路与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音乐学科日趋发展的新面貌。会议期间，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又临时增加了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问题。学术关照——民族音乐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民族的关系；民族音乐教育；民族音乐志的编撰方法；民族音乐研究的方法与范围。^④

第四届年会（包头会议）

大会议题——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学术评介——此次会议一致认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正处于有利时期。会议指出，继承和发展优秀的少数民族音乐，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此外，研讨会的论文同时展示了

① 学会名誉会长吕骥，顾问关鹤童（锡伯族）、杜矢甲（回族）、万桐书，会长刘烽，副会长牟耕、符盛松（苗族）、冯光钮、杨放（哈尼族）、艾买提江（维吾尔族）、杨士清（达斡尔族）、关也维（锡伯族），秘书长袁炳昌、副秘书长赵润波（满族）、毛继增。

② 参见邓如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讨论会召开第二届年会》，载《民族艺术》，1986年第4期，第222页。

③ 深入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坤河等少数民族乡，对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满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与民间音乐进行了实地考察。参见邓如金：《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讨论会召开第二届年会》，载《民族艺术》，1986年第4期，第222页。

④ 参见钱康宁：《聂耳故乡的盛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综述》，载《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第1期，第40页。